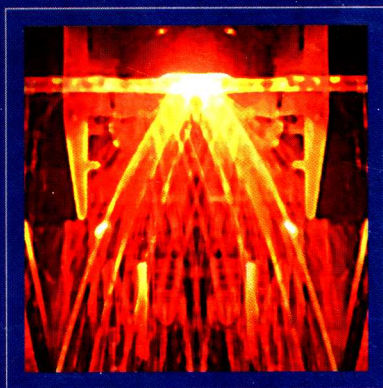


挑戰市場神話

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王紹光

挑戰市場神話

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gota Bombay
Buenos Aires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as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8 6 4 2

挑戰市場神話
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丁紹光

©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 19 590480 X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使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序言

收在本書中的十篇文章是在一九九〇至一九九六年間寫成的，曾先後發表在中國大陸、香港、美國和英國的中英文刊物上。這裏把它們結集出版，算是對過去幾年研究工作的一個小結。

在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日裔美國人福山發表一篇頗具爭議性的文章：「歷史的終結」。雖然他那篇文章遭到了很多人批駁，但不可否認的是，主宰今日世界的正是一種以「歷史已經終結」為主旨的意識形態。支撐這種意識形態的是一系列神話，如私有制的神話，市場的神話，分權的神話，西式民主的神話等等，不一而足。在很多人看來，私有制，市場，分權和西方式民主既是衡量各種制度優劣的尺子，也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如果說以前還有人探索過「第三條道路」的話，現在似乎只有一條道路可走，亦即是西式資本主義道路（或更準確地說，美式資本主義道路）。換句話說，歷史已經終結，道路已經確定，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不幸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已征服了相當多的中國人。經過幾十年艱難的摸索，中國人好不容易才擺脫了對國有制、計劃、大一統和專政的迷信。如果一轉身陷入另一類迷信，不知又要付出多少代價。

為了抵制這種來勢洶洶不可一世的意識形態霸權，近年來，我和一批朋友（如崔之元、甘陽等）對種種神話進行了初步的批判。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並不排斥私有經濟，並不否認市場的作用，並不反對適度分權，並不拒絕民主的原則。我們反對的只是對私有制、市場、分權、西式民主的迷信。

收在本書中的文章試圖對市場神話和分權神話提出挑戰。

序言

所謂挑戰市場神話，就是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同時也清醒認識到市場在其他方面的種種局限性，並繼而指出國家在市場經濟和市場轉型中的作用。所謂挑戰分權神話，就是承認分權在提高效率方面的潛能，同時也清醒認識到分權有其下限，並明確指出超出分權下限所可能帶來的嚴重經濟、社會、政治後果。

為了保存文章的本來面目，我在這裏對原文沒作甚麼改動，只是修正了個別錯字，變動了個別措辭。最後，我想借此機會向《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集》編輯部，《二十一世紀》編輯部，《戰略與管理》編輯部，《明報月刊》編輯部，《中國季刊》編輯部，華盛頓中國研究中心致謝，是他們為拙文的最初發表提供了機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挑戰市場神話

——國家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王紹光

冷戰結束後，一種以「歷史已經終結」為主旨的意識形態不斷地被張揚，支撐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是一系列的神話，如私有制神話、市場的神話、分權的神話、西方式民主的神話。在不少人看來，私有制、市場、分權和西方式的民主，既是衡量各種制度的尺子，甚至也是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

本書作者說，不幸的是，幾十年來一直不斷在探索人類社會出路的中國人，在好不容易擺脫了對國有制、計劃、大一統和專政的迷信後，竟轉身陷入另一種迷信，被這樣一種走美式資本主義道路的意識形所征服。

本書並不排斥私有經濟，並不否認市場作用，並不反對適度分權，並不拒絕民主原則，但反對對私有制、市場、分權、西方式民主的迷信。

作者王紹光，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訪問教授，本「社會與思想叢書」編委。著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合著有《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國地區差距報告》（均與胡鞍鋼合著）。

社會與思想叢書

王紹光 胡鞍鋼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

吳國光編
國家、市場與社會
—中國改革的考察研究, 1993 至今

吳國光 鄭永年
論中央-地方關係
—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

鄧 謙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

王紹光
理性與瘋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丁學良
共產主義後與中國

黃宗智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黃宗智
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

雷競璇 鄭宇碩
香港政治與選舉

何高潮
地主·農民·共產黨
—社會博弈論分析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編

甘 陽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會成員

王紹光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崔之元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旭東 美國魯格斯大學東亞系

張隆溪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目錄

序言	ix
第一章 效率·公平·民主	1
第二章 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	21
第三章 國家在市場轉型中的作用	69
第四章 中國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後果	83
第五章 中國改革分權的底線	99
第六章 國家能力與國防	135
第七章 中國軍費研究	155
第八章 中央地方財力之爭的體制根源	209
第九章 加強國家能力的新嘗試	237
第十章 公共財政與民主政治	257

第一章

效率・公平・民主

在中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十幾年，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的情況下，我認為，中國思想界（尤其是哲學界、經濟學界）實在應該圍繞改革的目標、方向和途徑，就其中的正義問題展開討論。改革的目的是不僅僅是為了建立一個更有效率的體制，而且亦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公正的體制。記得基辛格（H. Kissinger）曾在一本書中說，有兩種人很可悲，一種人是想實現某種目標，死活實現不了；另一種人實現了他們想實現的目標後，才發現那並不是他們所想要的。作為一個民族，尤其要防止這後一種可悲局面的出現。不少人已注意到制度變遷具有「路徑相關性」（path dependence），一旦走向一個方向，再要調整到另一個方向便發覺成本太大，有時甚至乾脆完全被鎖住了，沒法轉向。^①為了避免中國的改革被「鎖」進一條歧途，現在是把正義問題提上日程的時候了。

一 對「效率優先」論的質疑

八十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學家奧肯（A.M.Okun）的一本小書《公平與效率：巨大的兩難選擇》^②被譯介到中國。中國一些經濟學家似乎對奧肯在此書中表現出的明顯價值傾向毫無興趣，他們接受的只是公平與效率好比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個說法，並由此演化出一套「效率優先」的理論來。據他們說，中國人民在現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為此就應該在政策

上允許並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收入分配差別應適度擴大，藉以鼓勵和推動經濟增長。只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逐步使所有人都富起來。這些經濟學常常引用庫茲涅茨（S. Kuznets）的倒U型假說來支持自己的論點。該假說認為，各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差別的長期變動軌迹是先惡化、後改進。在經濟增長早期，收入分配差別開始擴大，不平等日趨嚴重；以後是短暫的穩定；到經濟發展進入後期的高水平階段，收入分配差別又逐步縮小，不平等狀態逐漸緩解^③。既然「客觀規律」如此，效率優先論者認為，企圖人為抑制貧富分化的趨勢必定是徒勞而有害的。他們還進一步提出，中國的基尼系數仍低於0.40，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還不算大^④。因此，收入差距不僅不應抑制，還應該適當地再拉開一些。

庫茲涅茨的倒U型假說真能用來支撐效率優先論嗎？恐怕不行。第一，倒U型假說只是假說而已，雖然曾有一位經濟學家大膽斷言，倒U型假說「已有了經濟定律的力量」，^⑤但關於這個假說的爭論仍在繼續。爭論本身說明假說還沒有上升到定律的地位。事實上，自庫氏提出倒U型假說後，不少學者從理論和經驗的層面上對其提出了批評。^⑥把仍頗有爭議的假說當作政策建議的依據，實在有點過於輕率。第二、即使倒U型假說正確描述了收入分配差別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一般變化趨勢，各國的收入分配格局仍可十分不同，事實也是如此。錢納里（H.B. Chenery）從經驗數據中歸納出有三種發展模式：一類是增長優先的模式，另一類是公平優先的模式，第三類是增長與公平同步模式。^⑦換句話說，即使有定律，但定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不同，收入分配的模式仍會大不一樣。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公平增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庫氏的倒U型假說是描述性的理論（是甚麼），而不是規範性的理

論（應是甚麼）。從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推出效率優先的政策建議，在邏輯上是大膽的一躍，但並不一定是庫氏本人願意引出的結論。第四，即使庫氏本人得出在經濟發展初期追求平等是有害無益的結論，這種以犧牲公平換取經濟增長的說法也不一定是對的，因為它只給出了工具性的理由，還沒有涉及到正義問題。

效率優先論在中國已流行了不少年，但迄今論者所持的依據基本上仍是工具性的。本文試圖從正義的角度討論效率是否應該優先，以此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對這個重要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二 對公平與效率的三種立場

在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關係問題上，西方學界有三種立場：效率優先、公平優先、折衷。

有意思的是，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思想家願意站出來公開地為效率優先辯護。支持效率優先的思想家必須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反駁公平優先論者。美國保守思想家克里斯多爾（I. Kristol）在評論奧肯那本書時就試圖證明，真正的兩難選擇並不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而是在公平與自由之間。^⑧「自由」聽起來比「效率」更加悅耳，高舉「自由」的旗幟迎戰「公平」，就不必扭扭捏捏了。這大概是為甚麼在海耶克（F. A. Hayek）、弗里德曼（M. Friedman）和諾茲克（R. Nozick）的書裏，「效率」根本不出現在索引中的一個原因。^⑨

事實上，效率是海耶克、弗里德曼們判斷一個制度優劣的重要標準。他們不強調效率，是因為僅從「效率」這個工具性的立場上來反擊公平優先論不如從「自由」這個道德立場上進行反擊有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相信效率是自由的副產品；一

個不自由的制度一定是個低效率的制度。反之，只要政府不侵犯作為個人自由基礎的私有財產，不干預人們進行自由交換的市場，經濟一定會是有效率的。既然如此，只要證明「自由」應優先於「公平」，「效率」也就隨之優先於「公平」了。

至於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不平等現象，自由思想家認為這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弗里德曼認為收入應按貢獻（勞務貢獻加資本貢獻）分配。能幹肯幹的人和資本雄厚的人，理應比愚蠢、懶散的窮光蛋收入多一些，因為這樣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資源。^⑩這裏，我們看到「效率優先」的馬腳露了出來。諾茲克則用過程的公正性證明結果的公正性。一個富可敵國的人，只要他的最初財產來路清白，且後來的財富積累是通過自由交易實現的，那麼他的富有便是無可非議的。至於貧富懸殊，則好處多多。如果沒有貧富懸殊，當汽車或電視剛問世時誰會有錢買呢？如沒有人買，新技術怎麼能發展呢？更何況，沒有貧富懸殊，誰會收購印象派的畫？如沒人收藏，豈不是湮沒了印象畫派嗎？^⑪這樣證明貧富懸殊的正當性，真可謂別出心裁！

西方的自由思想家在證明自由優先的同時順帶證明了效率優先，不知中國的效率優先論者是否願意在接受不平等方面走得與他們一樣遠。

羅爾斯（J. Rawls）在其經典著作《正義論》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正義原則^⑫：

所有社會價值（包括自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以及個人尊嚴的各項基礎）都應該平等分配，除非這些價值中的一項或全部的不平等分配能使所有人受益。

這個原則大概可以被稱之為公平優先原則。把這個原則運

用到我們討論的效率問題上，其推論應是：除非為提高效率所採取的措施會使每個人都受益（至少無人受損），這些措施所可能帶來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為提高效率所採取的措施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損，這些措施所可能帶來的不平等分配則是不可接受的。很明顯，羅爾斯並不堅持社會價值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平等分配，唯有在能使每個人，包括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受惠的情況下，不平等分配才說得過去。羅爾斯特別強調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人們的利益。他認為，只要這群人的利益受到損害，任何可能產生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措施都是不正義的，那怕它有利於提高效率。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運用經濟學家常說的「帕羅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作為效率概念，提高效率應與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絕對不會衝突，因為「帕羅托改進」被定義為當從狀態 A 進入狀態 B 時，至少有一人受益而無他人受損。但帕羅托效率概念的麻煩在於，在現實中，變動幾乎總可能使某人的利益受損。這樣即使全國99.99%的人得益於某項措施，但有那麼幾個人的利益受損，從定義上便不能稱之為「帕羅托改進」。為解決這個定義上的麻煩，人們通常用的效率概念雖然說是從帕羅托那兒沿襲下來的，實際上卻已經過了卡多（N. Kaldor）和希克斯（J. R. Hicks）的改造。卡多和希克斯把改進定義為：從狀態 A 進入狀態 B 時，雖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但受益者補償受損者的損失後仍有所得。^⑬「卡多—希克斯改進」只要求假想的補償，並不要求實際的補償。但當假想的補償不能付諸實施時，卡多—希克斯意義上的效率提高，就很明顯是與羅爾斯的正義原則互相衝突的。羅爾斯當然不會反對提高效率，他只反對以犧牲某些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提高效率。

中國的效率優先論者願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以收入二次分

配方式（累進稅收與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緩解提高效率措施帶來的不平等呢？

除了效率（自由）優先和公平優先兩種立場外還有一種可能性，這便是在追求效率和公平之間採取一種折衷立場。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 Kornai）曾一度採取過這種立場。1980年他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題為《效率與社會主義倫理原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強調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承認他那時的思想仍深受社會主義倫理原則的影響。當效率與公平衝突時，他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兩難的境地。要消除效率與公平的衝突是不可能的。只採一端則失去了另一端，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折衷是唯一的出路。的確，如果折衷得當，科爾奈相信衝突的原則可以實現「凸性組合」（convex combination），使兩個原則的長處都能體現。但他也警告，假如處理得不好，也許既得不到效率也得不到公平，賠了夫人還折兵。^④科爾奈後來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徹底拋棄了社會主義倫理觀。

奧肯則一直主張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採取折衷立場。具體說，就是犧牲一點效率以獲取比在沒有任何干預條件下的分配更公平的分配；同時容忍高於我們希望看到的不平等，以避免進一步干預可能帶來的效率損失。何處是折衷的最佳點呢？從經濟理論上說，這一點很容易確定，亦即，促進平等直到更高程度平等所帶來的收益正好等於它所造成的效率損失。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很難運用這個準則。現實世界裏的最佳折衷點只能由民主政治決定。不過奧肯提出的另一條準則也許是實用的，這就是犧牲效率必須是為了促進公平（或其他有價值的社會目標），犧牲公平必須是為了提高效率。他尤其強調後者。如果犧牲公平並不能改善效率，就絕對不應作出這個犧牲。細